

吉打華人甲必丹 戴春桃社會角色之研究

阮涌侖*

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戴春桃(1828-1922)是吉打亞羅士打華人社會中具有影響力的華人甲必丹。他是位惠州客家人，出生於中國，大概于19世紀中葉抵達亞羅士打。雖然亞羅士打的華人口，主要是以閩南和廣府兩大方言群為主，但是身為客家人的戴春桃卻能在兩大方言群為主的華人社會中，成為華人甲必丹，并領導亞羅士打華人社會，並獲得亞羅士打居民的尊重與愛戴。不過，在馬來西亞華人史上且很少對戴春桃做深入的研究，其生平事蹟也是大略提及，甚至對其甲必丹任期亦交代不清。因此本文將會對戴春桃的生平事蹟加以考證，之後將分析戴春桃在亞羅士打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戴春桃如何去獲得社會控制的權力。上述所做的釐清與分析工作，可以為將來想研究戴春桃時，有更為可靠的依據，以便可以進一步的去對戴春桃作深入研究。

關鍵詞：戴春桃、華人甲必丹、吉打、亞羅士打、華人社會

*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系碩士生。
聯絡地址：Insis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No.9 Jalan Bersatu 13/4,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一、前言

吉打(Kedah)位於馬來西亞(馬來半島)西北部的馬、泰邊界(見附圖 1)，原屬暹羅(Siam, 泰國的舊稱)管治。1909 年，脫離暹羅，歸英國殖民，成為馬來屬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¹亞羅士打則位於吉打的北部，自 1735 年成為吉打的首府，至今已有 276 年的歷史。²據文獻記載，可以發現吉打曾有六位華人甲必丹(Kapitan)，當中有瓜拉慕達(Kuala Muda)的峇峇成(籍貫、生卒年不詳)、亞羅士打(Alor Setar)的李欲正(福建漳州，?-1885)、李欲修(福建漳州，?-1888)、戴春桃(廣東惠州，1828-1922)以及居林(Kulim)的趙亞爵(廣東臺山、生卒年不詳)與羅啟立(廣東惠州，1867-1943)。³

在六位華人甲必丹中，戴春桃的生平事蹟較與其他五位華人甲必丹特別。特別之處在於原籍惠州客家人的他，既能在以閩南和廣府兩大方言群⁴為主的華人社會脫穎而出，成為華人甲必丹領導亞羅士打華人社會，而且還獲得華人社會、馬來社會以及英國人的尊敬與愛戴。然而，在吉打華人史上，卻很少對戴春桃生平事蹟作深入研究。有者，也是大略提及，甚至對其甲必丹的任期也無法確認。因此本文將會對戴春桃的生平事蹟及其甲必丹任期加以考證。同時探討他在亞羅士打獲得成功的因素。

¹ 芭芭拉·沃森·安達姬、倫納德·安達姬 著，黃秋迪 譯，《馬來西亞史》(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230-231。

² 陳鴻洲，《吉打風雨路》(亞羅士打：編者自行刊印，2005)，66-67。

³ 這六位甲必丹當中，峇峇成的原名無法考證。六位甲必丹的詳細資料，參考自 C.S.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4), 47-62.

⁴ 在早期，亞羅士打的華人社會都是以閩南、廣府兩大方言群為主。尤其在亞羅士打的社會架構來看，亞羅士打歷史較久的會館是廣東會館，建於1850年。在亞羅士打還有「福建街」是早期亞羅士打開拓史上主要的華族商人聚居的街道之一。福建會館的成立也有超過百年歷史。至於，從較早的華人方言群人口統計觀之，1911年亞羅士打的方言群人口，福建人占53%、廣東人占20%、客家人占10%、潮州人占14%、海南人占2%以及其他方言群占1%。因此，從這跡象看來，早期的亞羅士打的華裔人口是以閩南、廣府兩大方言群。參考鍾錫金，《吉打河，歷史的河流：「禾浪波外」》，第1集(亞羅士打：赤土文叢編輯部，1981)，14-24、30-40；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86。

從文獻回顧觀之，甲必丹戴春桃在馬來西亞華人研究的領域會被忽略，原因極可能是研究甲必丹的學者，將研究對象專注在歷史較悠久、文獻較多的州屬，如馬六甲、吉隆坡、霹靂等區域。位於較北的吉打州華人甲必丹在面對資料零散的情況下，因而只大略提起，並沒有作深入的研究。本文爲了彌補吉打華人歷史的不足，將嘗試對戴春桃的相關文獻做整理，以期對戴氏生平事蹟作考證時，有更爲扎實的基礎與依據，以便能更進一步去探討戴氏成功獲得亞羅士打華人社會的社會控制權之原因。

由於吉打華人甲必丹的資料缺乏及零散的情況下，以致目前學術界似乎未有學者以戴春桃作為針對性的研究對象，一般都是以傳記方式撰寫，未詳細分析，學術性顯然不足。這些傳記也只能視爲一般通俗性的傳略，如黃存燊的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許雲樵的〈中華民族拓殖馬來半島考〉、黃堯的《馬星華人志》、鐘錫金的《吉打二千年》與《吉打河，歷史的河流：「禾浪波外」》(第一集)及陳鴻洲的《吉打風雨路》。另有，《檳城惠州會館 180 年：跨越三個世紀的拓殖史實》，爲了紀念與表揚先賢對檳城惠州會館的功績，而撰寫了多位客家先賢的傳記，其中包括了戴春桃在內。⁵

上述有關戴春桃的傳記中，黃存燊在撰寫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一書時，利用了檔案資料作爲依據，爲後人對馬來半島的華人甲必丹有著進一步瞭解。此外，這本書最大的特點，即對馬來半島北部州屬(吉打、玻璃市、檳城)的華人甲必丹做了整理，這是研究華人甲必丹不可或缺的著作。之後，陸續出現一些對吉打華人甲必丹的研究，但內容都以黃存燊的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爲依據，內容大同小異，除了鐘錫金所編的《吉打河，歷史的河流：「禾浪波外」》的內容有些新的突破，餘者

⁵ C.S.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55-58; 許雲樵, 〈中華民族拓殖馬來半島考〉, 收於雪蘭莪中華大會堂五十四周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 《雪蘭莪中華大會堂54周年紀念特刊》(吉隆坡: 雪蘭莪中華大會堂, 1977), 507-549; 黃堯, 《馬星華人志》(吉隆坡: 元生基金會、馬來西亞黃氏聯合總會, 2003), 29; 鐘錫金, 《吉打二千年》(亞羅士打: 赤土文叢編輯部, 1993), 472-474; 鐘錫金, 《吉打河, 歷史的河流: 「禾浪波外」》, 第1集, 156-163; 陳鴻洲, 《吉打風雨路》, 385-387; 王琛發, 〈吉打華人甲必丹戴春桃先賢〉, 《檳城惠州會館180年: 跨越三個世紀的拓殖史實》(檳城: 檳城惠州會館, 2003), 55-57。

都只是停留在對他晚期的敘述，至於早期的事蹟並無新的發現。此外，許雲樵對戴春桃的生平掌握亦明顯不足，只用三言兩語的描寫就輕易帶過戴春桃的生平，而陳鴻洲所撰寫的《吉打風雨路》與檳城州惠州會館所出版的《檳城惠州會館 180 年：跨越三個世紀的拓殖史實》都是依據前人的成果為主，而且還有一些論述是值得商榷。

爲了補充此研究的不足之處，以及重構戴春桃與吉打亞羅士打華人社會的歷史，本文將會利用馬來西亞國家檔案館(Arkib Negara Malaysia)、吉打及玻璃市檔案館(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Kedah/Perlis)的官方資料，當中包括：*Fail Setiausaha Kerajaan Kedah*、*Salinan Surat kepada Raja-Raja*、*Surat Menyurat Sultan Abdul Hamid* 及 *Annual Report of the Kedah* 是本文不可或缺的一手資料。此外，當時在檳城出版的報章，如《檳城新報》與 *The Straits Echo*，都是作為了解北馬區社會動態的重要報章。接著，對於碑銘方面，將會以田野調查的方式對相關的碑銘進行搜集，以達到考證之用。總之，本文對戴春桃的事蹟(1828-1922)做考證，以讓後人更能了解戴春桃對華人社會所作的貢獻。

二、戴春桃生平之考證

戴春桃(1828-1922)，又名戴春華、戴阿桃，原籍廣東惠州客家人，出生于中國，大概 19 世紀中葉抵達亞羅士打。對於戴春桃的出生年份，據黃存燊在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一書所提及：

李欲修逝世後，他原本享有的特權乃轉給甲必丹戴春桃。因此戴春桃不得不負起額外的重任，執行李欲修在世時所負的職責。這時候，甲必丹戴春桃已達六十高齡。⁶

從李欲修的卒年(1888)計算，當時 60 高齡的戴春桃，出生年份應該是 1828 年，至於戴春桃的卒年則根據墓碑為證，該墓碑刻上「中華民國十一年歲次壬戌春月吉旦立」(見附圖 2)，再加上 1922 年的 *The Straits Echo* 新聞

⁶ C.S.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58.

也有報導戴春桃的出殯情況，可以證明戴春桃逝世于 1922 年，享年 94 歲。⁷至於其生平事蹟可以分為三時期去論述：第一、發迹之前；第二、發迹之後；第三、晚年時期。

(一)發迹之前

有關戴春桃早期事蹟的記載可說寥寥無幾，尤其在中國的活動資料幾乎沒有發現相關文獻的記載，因而導致戴春桃早期在中國的事蹟無從考證。不過，從文物記載上，可以發現戴春桃至少在 1866 年就已抵達馬來亞。這些文物更能證明在 1866 年至 1869 年期間，戴春桃是非常活躍于檳榔嶼華人社團與客家社會的活動。

相關文物即是海珠嶼大伯公宮「重修海珠嶼大伯公宮碑記」與檳榔嶼惠州會館「重修惠州會館碑記」兩份碑刻。這兩個碑銘都刻有戴春桃的名字與其捐獻的數額，首先，同治四年(1866)歲次乙丑冬月所立「重修海珠嶼大伯公宮碑記」中刻上「戴春桃捐銀貳員」(見附圖 3)。接著，同治八年(1869)歲次己巳孟夏月，惠州會館重修之際，所立了「重修惠州會館碑記」，也刻上「戴阿桃十大員」。⁸不過，陳鴻洲《吉打風雨路》以及王琛發〈吉打華人甲必丹戴春桃先賢〉中曾提及：「公元 1863 年，閩粵人聯合起來重修廣福宮之際，戴春桃捐獻 2 元」，⁹但經過田野調查後，發現在同治元年(1863)歲次壬戌臘月吉旦所立的「重修廣福宮碑記」並無刻上戴春桃之名，與陳鴻洲和王琛發兩人的說法有著出入。在重修廣福宮碑記上，發現在 359 位捐獻者中並沒有戴春桃，而且捐獻額最少為 10 大元。¹⁰但從「重修海珠嶼大伯公宮碑記」與「重修惠州會館碑記」兩個碑銘，足以說明了戴春桃至少在 1866 年已抵達馬來半島。

⁷ "China Capitan Funeral," The Straits Echo Mail Edition (Penang) Jan to Jun 1922, Arkib Negara Malaysia, Microform, No.2002/0002084, 17 May 1922, 531.

⁸ 參考自王琛發，〈檳城惠州會館文物選輯〉，《檳城惠州會館180年》，155。

⁹ 陳鴻洲，《吉打風雨路》，385；王琛發，〈吉打華人甲必丹戴春桃先賢〉，57。

¹⁰ 傅吾康、陳鐵凡 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第2卷(吉隆坡：馬來亞大學出版局，1985)，537-541。

從 19 世紀 60 年代的碑銘，可以證明戴春桃當時活躍于檳榔嶼的社區活動，反而在吉打州未能發現任何關於戴春桃的足跡。從這種跡象來看，戴春桃在這段時期並不是在吉打生活，甚至吉打也不是戴春桃最先落腳之地。檳榔嶼是戴春桃最先落腳的地方，并在逗留一段時間之後，才遷至吉打亞羅士打發展。¹¹ 早期華人多以檳榔嶼為落腳地，之後才到其他鄰邦發展，主要是當時檳榔嶼是馬來半島主要港口之一，同時英國政府也明瞭華人的工業可為檳榔嶼帶來繁榮與富裕，非常鼓勵華人移民到檳榔嶼發展。¹² 因此，在 19 世紀，華人在檳榔嶼人口提升，不少會館與寺廟的建立讓南來的華人有著寄託。同時，在 19 世紀 70 年代開始，吉打蘇丹正式分土地給華商，并鼓勵他們在這些土地上種植咖啡與丁香等，這也造成許多華人到吉打經商。¹³ 因此，從當時的社會發展觀之，戴春桃先到檳榔嶼，并以惠州會館為落腳之所，隨後因吉打親商政策而遷到吉打亞羅士打。

發迹之後

戴春桃遷到亞羅士打的時間無從考證，但以史料記載觀之，戴春桃受封華人甲必丹的年份或許可以證明戴春桃已開始在吉打落腳。從戴春桃的官印刻上“Kapitan Vijaya Setia Negeri Kedah, 1299A.H.”（見附圖 4）觀之，¹⁴ 西元 1882 年時，戴春桃大致已定居在亞羅士打。此外，黃存燊曾提到戴春桃抵達亞羅士打時，憑著兩三年的時間學習馬來語(Bahasa Melayu)與爪夷文(Tulisan Jawi)，從而瞭解馬來社會的風俗習慣，尊重馬來人的傳統和禁忌，

¹¹ 在〈檳城惠州會館〉一文所提到：「在 19 世紀到達檳城的華人，即使以檳城的會館為中心，并不一定就落腳檳威兩地。他們是以檳城為跳板，進入吉打、玻璃市、霹靂等地，足跡甚至遠踏泰國及印尼的蘇島。」參考自王琛發，〈檳城惠州會館史〉，《檳城惠州會館 180 年》，26。

¹²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sity Press, 1975), 39.

¹³ Haji Buyong Adil, *Sejarah Kedah*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1980), 74-75.

¹⁴ 此銀印上刻著：“Kapitan Vijaya Setia Negeri Kedah, 1299A.H.” 是從原文爪夷文翻譯而成的。參考自 The Seal of Tai Choon Thow ,Bearing the words “Kapitan Vijaya Setia Negeri Kedah, 1299A.H.,” Arkib Negara Malaysia, Gambar, No. 2001/0021780,

并與馬來人來往交流。¹⁵因此，戴春桃遷至亞羅士打的時間應當在 19 世紀 70 年代間，并投靠當地華人甲必丹——李欲修與李欲正¹⁶，服務于吉打蘇丹，任務是協助當時的甲必丹李欲修發展吉打經濟。¹⁷

1881 至 82 年，戴春桃連同李氏兩兄弟協助蘇丹阿都·阿密·哈林沙 (Sultan Abdul Hamid Halim Syah) 順利登上吉打蘇丹王位。戴春桃也因此事，被封為華人甲必丹，并恩賜一個銀印，上面刻有：“Kapitan Vijaya Setia Negeri Kedah, 1299A.H.”。接著，還贈送一把長劍及一支波刃短劍。¹⁸之後，暹羅國王亦贈送戴春桃一把長劍。這些贈物後來由李有文保管，日本軍佔領期間，李氏將其轉交警方保管，結果宣告遺失。¹⁹

戴春桃被封為華人甲必丹後，獲得吉打蘇丹批准一些行業的餉碼承包權，并享有稅收特利權 (Ampun-Kurnia)。²⁰1882 年，戴春桃開始獲得吉輦 (Krian) 為期四年的棕櫚樹餉碼承包權，以供早期居民建房子之用。²¹同年，戴春桃獲得更多吉輦的行業餉碼承包權，當中包括鴉片、酒、賭博、

¹⁵ C.S.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55.

¹⁶ 李欲修與李欲正，是吉打出生的福建人，他們的關係為兄弟。他們在馬來社會成長，加上幼年時，白天進巫校念書，晚上則讀華語，因此他們精通爪夷文，深獲華巫兩族人士的尊敬。馬來社會也稱李欲修為Eh-ma(阿瑪)，李欲正為Eh-tok(阿督)。他們被蘇丹委任為吉打甲必丹，李欲修被賜封為Dato Vijaya Besare，委任為財政司；李欲正則為蘇丹的私人秘書。詳見于C.S.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 54-55.

¹⁷ 吉打與宋卡(Singgora)之間的道路是由宋卡國王在1866年所建。建此道路的原因是在當時兩地已有很多生意的來往。蘇丹也因為此道路建成後，開始委任兩位華人甲必丹，既是Ah Seng和Ah Saw，以處理華商日後在做生意所面對的問題。詳見Haji Buyong Adil, *Sejarah Kedah*, 74-75.

¹⁸ C.S.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56.

¹⁹ 根據黃存榮所提及在Fail Setiausaha Kerajaan Kedah No.285/1361有記錄著李有文將上述贈物轉交警方之事，但在國家檔案局與吉打及玻璃市檔案館暫未找到此檔案。參考自C.S.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56.

²⁰ 此特權原是由蘇丹賜予其(馬來)臣民的一種終生專利權或收稅權，以替代薪金或津貼。獲得恩賜的臣民，有權徵收某些稅賦(如收取某些特別產品的出口稅等)，亦擁有買賣權(Right of Market)和擺渡權(Right of Ferry)，這些專利幾乎都是租借給華人，以保證按期擁有一定的收入。參考自C.S.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54.

²¹ Surat-surat Pajak, 1827-1887, No. 15,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Kedah/Perlis, Surat Menyurat Sultan Abdul Hamid, 106-107.

鹽、煙草、甘密、木、藤、稻米、雞鴨，為期三年。²²這些餉瑪承包權，讓戴春桃在吉打商業建立本身的勢力，其中木與藤更能讓他生產不同的產品出售，賺取一筆額外的收入。²³1887年，又獲得為期三年在瓜拉姆達(Kuala Muda)與瑪莫(Merbok)生產石灰的餉瑪承包權。²⁴接著，1898年，戴春桃獲得為期三年的居林豬業的餉瑪承包權。²⁵

戴春桃在擁有這些商業餉瑪承包權後，按時有著固定的收入情況下，也與華社領袖對會館作出一些貢獻。就以吉打州廣州暨汀州會館²⁶的歷史記載：

1871年，在甲必丹劉任昌公及先賢周灶潤、趙任堅、張亞連、陳文光等先賢的領導下，集資購買海墘街門牌24號A樓房，并將會所遷入此地，更名「廣東會館」，繼後再由甲必丹戴春桃公及陳文灶、李洪彪、張亞連等先賢領導，集資向前甲必丹之掛沙人²⁷英國人比伸之手購置海墘門派25號及26號樓房。²⁸

雖記載沒說明戴春桃在何時與多位先賢集資購買另兩間樓房，以供廣東會館之用，但可以肯定戴春桃對於亞羅士打廣東會館有著一定的貢獻。

²² Surat-surat Pajak, 1827-1887, No. 15,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Kedah/Perlis, Surat Menyurat Sultan Abdul Hamid, Surat kecil pajak Kerian beri pada Kaptan Bijaya Setia, 1 Muharram 1300 (12 November 1882), 125.

²³ Surat-surat Pajak, 1827-1887 No. 15,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Kedah/Perlis, Surat Menyurat Sultan Abdul Hamid, 129-130.

²⁴ Surat-surat Pajak, 1827-1887, No. 15,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Kedah/Perlis, Surat Menyurat Sultan Abdul Hamid, Rencana surat kecil pajak Guar Kepah kepada Kaptan Bijaya Setia di dalam perintah Kuala Muda dan Merbok, 22 Ramadhan 1304 (14 June 1887), 310.

²⁵ Surat-surat Pajak, 1897-1899, No. 7,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Kedah/Perlis, Surat Menyurat Sultan Abdul Hamid, Surat Kecil Pajak Babi Kulim Pada Kapitan Bijaya Setia Lamanya Tiga Tahun, 15 Zulkaedah 1315 (6 April 1898), 18-19.

²⁶ 廣州暨汀州會館是歷史較悠久的華人社團，于1850年成立，當時是用「廣東大公司」及「武帝廟」之名。1871年，更名為「廣東會館」，直到1923年，才取名為「廣東暨汀州會館」。參考自吉打廣東暨汀州會館編委會：《吉打廣東暨汀州會館》(亞羅士打：吉打廣東暨汀州會館，2000)，22。

²⁷ 「掛沙」一詞源自馬來文“kuasa”，而「掛沙人」在馬來文的原意是“penguasa”，“penguasa”的意思是指管理人或統治者。因此，文中所提及「掛沙人」的意思是指產業的管理人。

²⁸ 吉打廣東暨汀州會館編委會，《吉打廣東暨汀州會館》，22。

大概在 20 世紀初，戴春桃已達退休年齡，因而宣告退休，吉打政府為了答謝戴春桃，每月給予 175 元的養老金。²⁹1909 年，當英國人間接管理吉打政府行政後，戴春桃養老金就遭到英國政府終止。³⁰

(二)晚年時期

退休之後，戴春桃雖然不再是官員，但還是以華人甲必丹的身份，對亞羅士打華人社會的建設做出貢獻。在這段時期，戴春桃對於推動教育，建設寺廟有一定的貢獻。從《檳城新報》中發現戴春桃在當地推動教育扮演著重要角色，以中華學校³¹的發展觀之，在創校期間戴春桃擔任該校的名譽總理，「名譽總理」是給予對學校長期捐款者或對學校有貢獻者的一個稱號。³²1919 年 10 月，戴春桃與一位馬來領袖端武力(Tuan Wuli)，一起將保留地捐給華人社會，建立了廣福宮(見附圖 7)。³³同時，在廣福宮的地段上，也允許免租金給華人興建學校。³⁴

除此之外，身在亞羅士打的戴春桃也非常關注中國的發展狀況。1908 年，中國廣東發生水災，戴春桃就以主席身份主持廣東救援區域會議，號召了當地華人領袖到來商論設立救災基金協助廣東災民。³⁵基金成立後，

²⁹ C.S.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58.

³⁰ 關於戴春桃的退休金在1910年停止是根據黃存燊提及甲必丹戴春桃孫子戴有源告知，他在亞羅士打擔任掌櫃書記時，曾經在檔案中看到養老金被終止發給的事。但經筆者到國家檔案館與吉打及玻璃市檔案館查閱，暫還未在吉打秘書文件夾中，發現此檔案來證明戴春桃的養老金被終止一事。C.S.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58.

³¹ 中華學校是在1911年，由廣東會館領袖陳英担、譚桂芳、鄭輔道及黎紹嵩等先賢創立。最初是暫借福建會館為校舍。直到1928年，購買一座洋房為校舍。1935年，中華學校、福建女校及南華學校進行合併，并易名為華僑學校。之後，在1963年將「華僑」改為「吉華」。發展至今，有吉華國民型中學、吉華國民型中學(二校)、吉華獨立中學、吉華(H)校、吉華(K)校及吉華(S)校。參考自吉華學校編委會，《吉打吉華中小學卅周年紀念刊》(亞羅士打：吉華學校，1965)，11。

³² 〈本校民國八年職員一覽表〉，《檳城新報》，1919年1月2日，第3頁。

³³ 鐘錫金，《吉打河，歷史的河流》，153-154。

³⁴ 鐘錫金，《吉打河，歷史的河流》，154。

³⁵ “Kedah Day by Day,” The Straits Echo Mail Edition (Penang) Jan to Jun 1922, Arkib Negara Malaysia, Microform No.2002/0002084, 17 May 1922, 764.

并籌獲 116 元轉交給檳城的羅奇生³⁶號(Chop Lo Kong Sang)，以救濟當地災民，戴春桃在這次的捐款中捐出 10 元。³⁷在 1922 年初，戴春桃逝世，享年 94 歲。其墳基建于亞羅士打檳榔山(Bukit Pinang)義山。

三、戴春桃社會角色之分析

從戴春桃的生平觀之，他在亞羅士打華人社會是位有名望的華人領袖，同時在吉打社會也擁有足夠影響力。但從戴春桃初到馬來半島的事蹟觀之，并非一開始就是有著影響力的社會領袖代表。初到馬來半島時，他是憑著自己的努力與當地居民的良好互動關係，慢慢地在亞羅士打建立自己的名望，從而掌握了對亞羅士打華人社會的控制權力。因此，戴春桃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透過了某種方式去獲得對華人社會的控制。主要是因為一個人在進行日常活動時，便創立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社會世界，影響身邊的人；反之，他也會受到社會的影響與引導，這種人與人以及人和社會之間的連結，來自「社會互動」。³⁸「社會互動」是指人們生活在團體之中，思想、行為和感覺的方式，受到了社會制裁，遵循著彼此責任，形成各種動態或社會行為。³⁹因此，戴春桃在與社會之間的互動則免不了會與當地居民之間有著信任關係、互助關係及資源互換關係，這些既可以協助戴春桃得到「社會控制」的權利。所謂「社會控制」，是指用來支持社會規範及制止對規範實際或潛在破壞的那些機制，而社會控制也包含了管理個人和團體行為的權力，有時則是「強制力」。⁴⁰

當一個人有了「強制力」，就能對社會的個人或團體加以控制，讓人

³⁶ 羅奇生是新加坡商人，1841年來到新加坡，開設煙莊和醬油雜貨店，並與朱廣蘭、廣恒、朱有蘭、同德、羅致生、朱富蘭六人，稱為「中街七頭家」。1889年，「新加坡勸捐董事」成立，羅奇生是其中一員，並號召新馬各地的華商捐獻救濟中國災民。詳見于黃建淳，《晚清新馬華僑對國家認同之研究：以賑捐投資、封爵為例》，(臺北：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1993)，186。

³⁷ “Kedah Day by Day,” The Straits Echo Mail Edition (Penang) Jan to Jun 1922, Arkib Negara Malaysia, Microform No.2002/0002084, 17/5/1922, 785.

³⁸ 賴特、凱勒 合著；林義男 譯，《社會學》，上冊(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88)，130。

³⁹ 謝康，《社會學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58。

⁴⁰ 賴特、凱勒 合著；林義男 譯，《社會學》，上冊，323。

服從其領導。但社會領袖能不能成功長久讓人們對其領導有著信心，就需要符合三個條件：第一、個人形象塑造；第二、保持互助；第三、資源互換。這三個條件，是取決於個人自身對社會之間的行為，一旦這些行為成功讓當地社會接受，那就能成為成功的領袖。因此，接下來將通過戴春桃在華人社會扮演的角色分析戴氏如何從社會的互動來取得及維持對華人社會的控制權力，建立其自己在社會的「強制力」。

(一)個人形象塑造

個人形象塑造的現象，被社會學家郭夫門(Erving Goffman)稱為是一種「形象處理」，在各種不同場合，彼此面對面關係中，會不斷地互相觀察別人的身份、背景、工作，所以造成一個人有很強烈的動機去影響別人對自己的形象，在這種情況下，都只會公開部份對自己有利的事，其餘的就隱藏起來。⁴¹「形象處理」可以協助個人與社會之間建立起信任的關係。

首先，以戴春桃初到亞羅士打，先是以一種「入鄉隨俗」的觀念，學習當地土著的語言與文化，這行為不單可以達到彼此互相瞭解，還可以進一步獲得當地居民的信任，讓彼此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主要是語言是聯絡人際關係最重要的手段，是大眾傳訊的工具，它能促進人們相互瞭解，亦能使人們發生爭吵和打鬧，它也能使一切成例及社會文化遺傳得以傳遞和保存。⁴²因此，戴春桃透過瞭解當地居民文字、語言與文化後，並能與華人社會與非華人社會溝通，透過這個優勢也促使戴春桃有機會成為華人社會與當地居民、甚至華人社會與吉打政府之間的中介者。通曉當地居民語言與文化的優勢，也讓當時甲必丹李氏兩兄弟對戴春桃留下不錯的印象。之後李欲修的兒子還入贅戴家，成為戴春桃女婿，建立起密切關係，同時間接協助了戴春桃在亞羅士打的影響力漸漸的擴大。李欲修去世後，所享有的特權轉給戴春桃，因此戴春桃負起重任，執行李欲修在世時的職責。⁴³

⁴¹ 賴特、凱勒 合著；林義男 譯，《社會學》，上冊，135。

⁴² 謝康，《社會學研究》，61。

⁴³ C.S.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58.

除此之外，吉打皇室于1881年爆發王位繼承危機中，對戴春桃在亞羅士打的地位有著一定的影響。這主要是因為蘇丹惹諾·阿比汀·姆阿占沙二世(Sultan Zainal Abidin Muazzam Shah II)的去世，導致出現兩派勢力爭奪王位。展開王位繼承鬥爭的兩派勢力為：當時首相旺·穆罕默德·沙曼(Wan Muhammad Saman)為首的勢力，其主要是推薦已故蘇丹的親弟弟——東姑阿都·查立·甫特拉(Tunku Abdul Jalil Putra)為吉打蘇丹；另一派為已故蘇丹的叔父材烏汀(Ziauddin)為首，推薦已故蘇丹的同父異母的弟弟——東姑阿都·哈密為蘇丹。當時候，戴春桃與甲必丹李欲修與李欲正則是支持東姑阿都·哈密為蘇丹，而且還參與了材烏汀所組成的代表團前往曼谷謁見暹羅國王，要求批准任命東姑阿都·哈密為蘇丹，并稱為蘇丹阿都·阿密·哈林沙。⁴⁴蘇丹阿都·阿密·哈林沙在登基後，因此論功獎賞，戴春桃受封“Kapitan Vijaya Setia”正是「忠心」的意思，也反映了戴春桃是忠心于蘇丹。從王位繼承危機中，可以看到戴春桃塑造了忠心的形象，全力支持蘇丹阿都·阿密·哈林沙，因此在王位鬥爭結束後，他獲得蘇丹的重用。同時，戴春桃擁有語言的優勢的情況下，可以結識到吉打皇室成員。

總的而言，戴春桃「入鄉隨俗」的觀念，是一種內在的塑造，讓自己與其他華人社會群體建立了不同的特點，同時也成為戴春桃在亞羅士打的一個優勢。這種行為稱之為「形象處理」，並將生活變成了一個舞臺，在舞臺上每一個人與他人扮演互動的角色，而每一個人既是演員又是觀眾，個人在演出時，希望得到他人的讚賞和鼓勵；因此，社會生活是由影響他人對於我們的形象所組成；而影響別人形象的方式，則是讓人知道，我們是「有所為」與「有所不為」的。⁴⁵戴春桃初到吉打，就經過內在的塑造，通過掌握不同的語言優勢，給當地居民有著好形象。接著，戴春桃還忠心于蘇丹，而且還協助登上蘇丹寶座。這些種種行為，讓戴春桃給予當地居民與吉打統治階層有著良好的形象，從而從初來的不信任轉變成信任。

⁴⁴ C.S.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57.

⁴⁵ 賴特、凱勒 合著；林義男 譯，《社會學》，上冊，134。

(二) 互助關係

戴春桃在亞羅士打與統治者和居民建立彼此信任的關係後，自然的成為了當地居民與統治階級之間的溝通橋樑。同時，蘇丹還批准了吉打部份的餉碼承包權給戴春桃，讓他有著穩定的收入。這種情況下，戴春桃在政治與商場的勢力已經建立起來了。這時候，戴春桃更要關注的是要如何維持在政治與商場的優勢。

在經濟穩定的情況下，戴春桃開始與當地的商人建立密切的關係，經常保持聯繫，已達互助的效果。因此，戴春桃的社會角色開始有著轉變，並不能再以「形象處理」的方式來維持他的社會地位。這主要是因為戴春桃當上華人甲必丹後，需要負責當地華人事務，同時在甲必丹李欲修去世後，還必須繼承財政司職責，就是處理華商日後在生意所面對的問題。⁴⁶這時候戴春桃必須與華商、當地居民及社群建立起一種協商的互動關係。因為，一個人的身份地位，是根據一個人自由的限度和與他來往的限度去定義的，因此，一個人的身份並不是一旦決定就永遠不變；而是在一個競爭和視他人好惡而定的情況下，不斷的協商訂定的。⁴⁷在商場上，更是戴春桃需要關注的一環，而且還要不斷與商人協商，以達到雙贏局面，以維持社會的秩序。

從檔案記載發現，戴春桃在這時期經常與吉打華商一起出席一些官方場合，關係非常密切。在 1895 年，戴春桃還與一班華商出席移交委任狀與印章典禮。⁴⁸隔年，暹羅國王到訪吉打，戴春桃與一班吉打華商代表也出席該次的官方場合，並在亞羅士打巴萊勿剎(Balai Besar)拍下歷史性的照片(見附圖 6)。⁴⁹除此之外，戴春桃與兩位華商曾在 1901 年呈交聯合簽署信

⁴⁶ C.S.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58.

⁴⁷ 賴特、凱勒 合著；林義男 譯，《社會學》，上冊，133。

⁴⁸ Salinan Surat Kepada Raja-Raja(1895) No. 2,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Kedah/Perlis, Surat Menyurat Sultan Abdul Hamid, Di Dalam Pekerjaan Sambut Surat Tera dan Bentang Persalinan Dengan Titah Tapak Jerap Duli Tunku Raja Muda, 1 Jamadilawal 1313 (19 Oktober 1895), 19.

⁴⁹ 此照片于1896年所拍，在暹羅國王拜訪後，兩國的官員一起拍照為念。照片裡頭可以看到一班吉打華人代表，當中有一位正是戴春桃。但黃存榮與Haji Buyong Adil

件，向蘇丹提出關於降低提供甘蔗廠用來取火的木材價格。⁵⁰

從這種跡象看來，戴春桃在這階段不單要維持他在社會的控制權力，而且還要維持本身與當地商人在經濟方面的利益。因此，可以看到戴春桃與華商保持著密切的互助關係，並一起合作，爭取大家共同的目標。

(三)資源互換

戴春桃退休後，就會讓他慢慢的無法對社會有著控制權力，這也代表會減弱他在社會的勢力。從種種跡象觀之，其實可以發現戴春桃有意識的想維持他在亞羅士打的身份與地位的意願。因為，戴春桃在退休後，開始是以一種「捐獻者」的身份來與當地居民進行資源交換的互動。主要是因為交換論者相信，社會互動視接受他人酬賞的反應而定，當報酬沒了，互動便跟著停止，關係也就結束了。⁵¹

因此，在戴春桃退休後，還常以捐地或捐錢來協助華社的建設。正如中華學校、廣福宮的建立，戴春桃的貢獻不小，這不但讓當時從中國南來的華人能夠受教育，還能在他國異鄉得到心靈的寄託。在資源互換的過程中，還可以看到戴春桃非常瞭解華人社會需要什麼東西。因此，透過資源交換，當地華人社會可以獲得金錢與土地來建設；戴春桃則是換來了地位、名氣等東西。

從晚年的事蹟觀之，戴春桃還是受到居民的愛戴和歡迎，甚至，英國官員也對戴春桃表達敬意。從檔案文獻記載觀之，戴春桃曾在 1916 年生病，英國官員很關心戴春桃的病情，每隔幾天都會有官員去探望戴春桃，

在著作中提到，照片是于1874年4月所拍，當時是暹羅國王到來吉打，作為期六天的訪問。但經過考證，發現國家檔案局記載是在1896年才拍攝。詳見C. S. 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56; Haji Buyong Adil, *Sejarah Kedah*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1980), 75及“Sultan Abdul Hamid Halim Shah, Gambar berkumpul semasa lawatan Raja Siam ke Kedah, 1896,” *Arkib Negara Malaysia*, Gambar, No. 2001/0027556.

⁵⁰ Surat-Surat Pajak (1900) No. 9, *Arkib Negara Malaysia Cawangan Kedah/Perlis*, Surat Menyurat Sultan Abdul Hamid, Pasal Kayu Api, 9 Syawal 1318 (29 January 1901), 8.

⁵¹ 賴特、凱勒 合著；林義男 譯，《社會學》，上冊，140。

直到康復為止。⁵²1922年，戴春桃出殯當日，當地的居民及亞羅士打所有的華人組織與協會都獻上花圈或布條以示對戴春桃的敬意。此外，當地華文學校的學生也穿著整齊的校服加入遊行隊伍，以送戴春桃最後一程。⁵³值得注意的是馬來社會也有代表出席葬禮，還以馬來文朗誦馬來詩歌以表敬意。⁵⁴

總的來說，戴春桃晚年時期雖然已經退休，但還是以「捐獻者」的身份來維持他在社會控制的權力。因為，有著社會控制權力，所以在當時的社會擁有著「強制力」，這也可以被視為權威的象徵，讓身邊的人信服與尊敬。

四、結語

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身為客家人的戴春桃竟能擔任華人甲必丹領導亞羅士打華人社會，可說是不易。從社會學的角度觀之，一個人的成功與失敗，關鍵取決於一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及與社會之間的互動，因而影響其社會地位。在過程中，往往就是有兩種方式去與社會互動：第一、合作性；第二、衝突性，這足以影響其一生。

從戴春桃的生平事蹟觀之，其之所以能成功，關鍵於他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都處於合作性的關係。首先，戴春桃初到亞羅士打時，從形象的塑造；接著當上社會領袖後，與商人的協商；當他退休之後，與華人社會進行資源的交換。整個過程中，可以清楚看到身為客家人的戴春桃，表現出他願意跨越方言群及族群，一起合作與協商的意願。就以戴春桃初到亞羅

⁵² Illness of Tee Choon Too “Capien Bijaya Setia,” Arkib Negara Malaysia, Fail Setiausaha Kerajaan Kedah, No.1511/1334, 31 March 1916.

⁵³ “China Capitan Funeral,” The Straits Echo Mail Edition (Penang) Jan to Jun 1922, Arkib Negara Malaysia, Microform, No.2002/0002084, 17 May 1922, 531.

⁵⁴ 在戴春桃出殯當天，馬來人代表端賽哈山(Tuan Syed Hassan)與萬吉(Wan Chik)出席，並以馬來詩歌來歌頌戴春桃：“Emas, Perak, kebesaran dunia Budi yang baik membawa mati” 這首詩歌的意思是對戴春桃的道德品格的讚賞，主要是比喻金與銀在這世界多么重要，都無法取代戴春桃的道德品德。“China Capitan Funeral,” The Straits Echo Mail Edition (Penang) Jan to Jun 1922, Arkib Negara Malaysia, Microform, No.2002/0002084, 17 May 1922, 531.

士打，與兩位籍貫為福建的華人甲必丹--李欲修與李欲正一起合作，為當地華商爭取利益。直到 20 世紀初期，協助亞羅士打中華學校與廣福宮的建立，表現出戴春桃與其他方言群社會及馬來社會之間，已建立起合作的關係。戴春桃跨越方言群及族群的舉動，不單讓他獲得不同方言群及族群的支持，還讓他在當地建立了良好的人際關係。同時，戴春桃擁有著一定的財富，再加上獲得蘇丹的信任，更讓他建立對華人社會控制的優勢。

總而言之，戴春桃成為華人甲必丹，透過跨越方言群及族群來塑造良好形象、互助與資源交換的方式，讓其在亞羅士打擁有著崇高地位，並受當地人們及統治階層的愛戴與尊敬。除此之外，本文釐清戴春桃的生平事蹟，可以為將來研究戴春桃時，有著更為充實的依據。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檔案資料

1. 馬來西亞國家檔案館藏

1. Illness of Tee Choon Too“Captian Bijaya Setia,” *Fail Setiausaha Kerajaan Kedah* No.1511/1334, 31-3-1916.
2. *The Seal of Tai Choon Thow, Bearing the words “Kapitan Vijaya Setia Negeri Kedah, 1299A.H,”* Gambar Foto No. 2001/0021780.
3. “Sultan Abdul Hamid Kalim Shah, Gambar berkumpulan semasa lawatan Raja Siam ke Kedah, 1896,” Gambar, No. 2001/0027556.
4. The Straits Echo Mail Edition (Penang) Jul to Dec 1908, Microform No. 2002/0002084.
5. The Straits Echo Mail Edition (Penang) Jan to Jun 1922, Microform No. 2002/0002090.

2. 吉打及玻璃市檔案館藏

1. Surat Menyurat Sultan Abdul Hamid: Salinan Surat Kepada Raja-Raja 1895, No 2.
2. Surat Menyurat Sultan Abdul Hamid: Surat-surat Pajak 1897-1899, No. 7.
3. Surat Menyurat Sultan Abdul Hamid: Surat-Surat Pajak 1900, No. 9.
4. Surat Menyurat Sultan Abdul Hamid: Surat-Surat Pajak 1827-1887, No. 15.

(二) 專著

1. 芭芭拉·沃森·安達婭、倫納德·安達婭 著，黃秋迪 譯，《馬來西亞史》，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
Andaya, Barbara Watson and Leonard Y. Andaya, zhu, Huang Qiudi, yi. *Malaysia*

- shi. Beijing: Zhong guo da ba ike quan shu chu ban she, 2010.
2. 陳鴻洲，《吉打風雨路》，亞羅士打：編者自行刊印，2005。
Chen, Hongzhou. *Ji da feng yu lu*. Yaluoshida: bian zhe zi xing kan yin, 2005.
 3. 傅吾康、陳鐵凡 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全3卷，吉隆坡：馬來亞大學出版局，1985。
Fu, Wukang, Chen Tiefan, bian. *Malaysia hua wen ming ke cui bian*. quan 3 juan, Kuala Lumpur: Malaysia da xue chu ban she, 1985.
 4. 黃建淳，《晚清新馬華僑對國家認同之研究：以賑捐投資、封爵為例》，臺北：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1993。
Huang, Jianchun. *Wan qing xin ma hua qiao dui guo jia ren tong zhi yan jiu: yi zhen juan tou zi, feng jue wei li*. Taipei: Zhong hua min guo hai wai hua ren yan jiu xue hui, 1993.
 5. 黃堯，《馬星華人志》，吉隆坡：元生基金會、馬來西亞黃氏聯合總會，2003。
Huang, Yao. *Ma xing hua ren zhi*. Kuala Lumpur: Yuan sheng ji jin hui, Malaysia Huang shi lian he zong hui, 2003.
 6. 賴特、凱勒 合著，林義男 譯，《社會學》，全2冊，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88。
Light, Donald, Suzanne Keller, he zhu, Lin Yilan, yi. *She hui xue*. quan 2 ce, Taipei: Ju liu tu shu gong si, 1988.
 7.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
Mai, Liufang. *Fang yan qun ren tong: zao qi xing ma hua ren de fen lei fa ze*.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ming zu xue yan jiu suo, 1985.
 8. 謝康，《社會學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Xie, Kang. *She hui xue yan jiu*. Taipei: Tai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83.
 9. 鐘錫金，《吉打河，歷史的河流：「禾浪波外」》，第1集，亞羅士打：赤土文叢編輯部，1981。
Zhong, Xijin. *Jida he, li shi de he liu: "he lang bo wai"*. di 1 ji, Yaluoshida: chi tu wen cong bian ji bu, 1981.
 10. 鐘錫金，《吉打二千年》，亞羅士打：赤土文叢編輯部，1993。
Zhong, Xijin. *Jida er qian nian*. Yaluoshida: chi tu wen cong bian ji bu, 1993.
 11. Wong, C. S..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4.
 12. Adil, Haji Buyong. *Sejarah Kedah*.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1980.

13. Ahmat, Sharom.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 Malay State: A Study of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1878-1923*. Kuala Lumpur: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Monograph No. 12), 1984.
14. Purcell, Victor. *The Chinese In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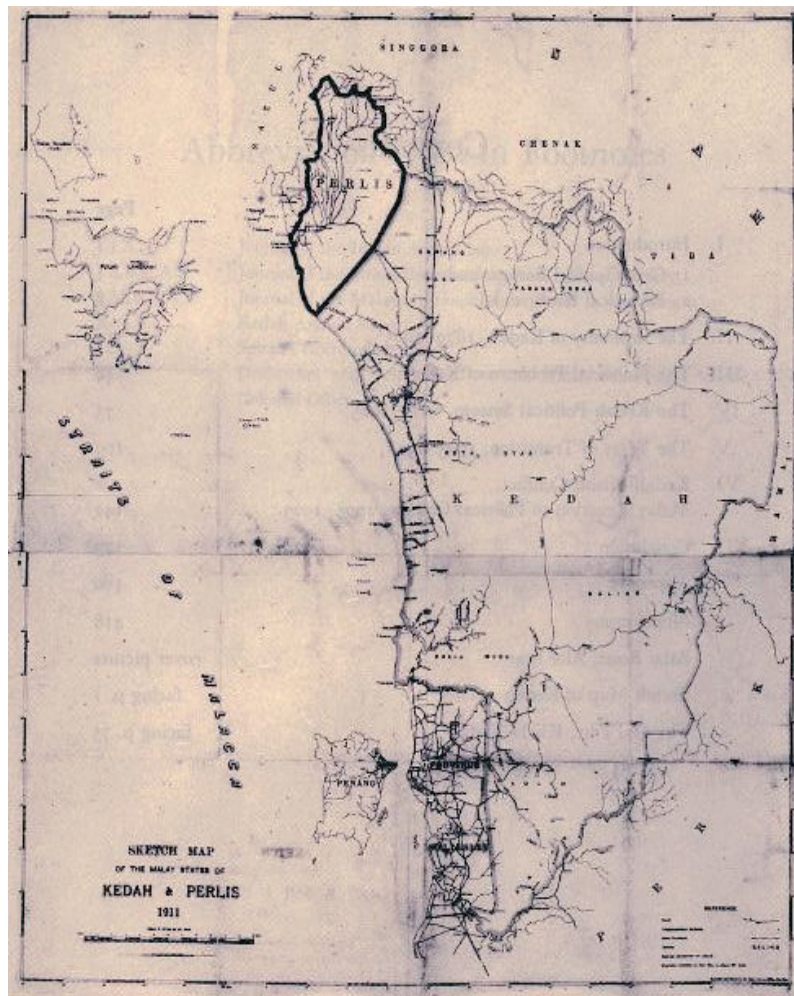
(三)特刊

1. 吉打廣東暨汀州會館編委會，《吉打廣東暨汀州會館》，亞羅士打：吉打廣東暨汀州會館，2000。
Jida Guangdong ji Ting zhou hui guan bian wei hui. *Jida Guangdong ji Tingzhou hui guan*. Yaluoshida: Jida Guangdong ji Tingzhou hui guan, 2000.
2. 吉華學校編委會，《吉打中華中小學卅周年紀念刊》，亞羅士打：吉華學校，1965。
Jihua xue xiao bian wei hui. *Jida Zhong hua zhong xiao xue sa zhou nian ji nian kan*. Yaluoshida: Jihua xue xiao, 1965.
3. 許雲樵 著，〈中華民族拓殖馬來半島考〉，收入雪蘭莪中華大會堂五十四周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雪蘭莪中華大會堂54周年紀念特刊》，雪蘭莪：雪蘭莪中華大會堂，1977。
Xu, Yunqiao, zhu. "Zhong hua min zu tuo zhi ma la ban dao kao," shouru xue lan e Zhong hua da hui tang wu shi si zhou nian ji nian te kan bian ji wei yuan hui, *Xue lan e Zhong hua da hui tang wu shi si zhou nian ji nian te kan*. Selangor: Xue lan e Zhong hua da hui tang, 1977.
4. 王琛發，《檳城惠州會館180年：跨越三個世紀的拓殖史實》，檳城：檳城惠州會館，2003。
Wang, Chenfa. *Bin cheng Huizhou hui guan 180 nian: kua yue san ge shi ji de tuo zhi shi shi*. Penang: Bin cheng Huizhou hui guan, 2003.

(四)報刊(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藏)

1. 〈本校民國八年職員一覽表〉，《檳城新報》，1919年1月2日，第3頁。
"Ben xiao min guo 8 nian zhi yuan yi lan biao," *Bin cheng xin bao*, 1919.01.02, di 3 ye.

附圖1 吉打州(Kedah)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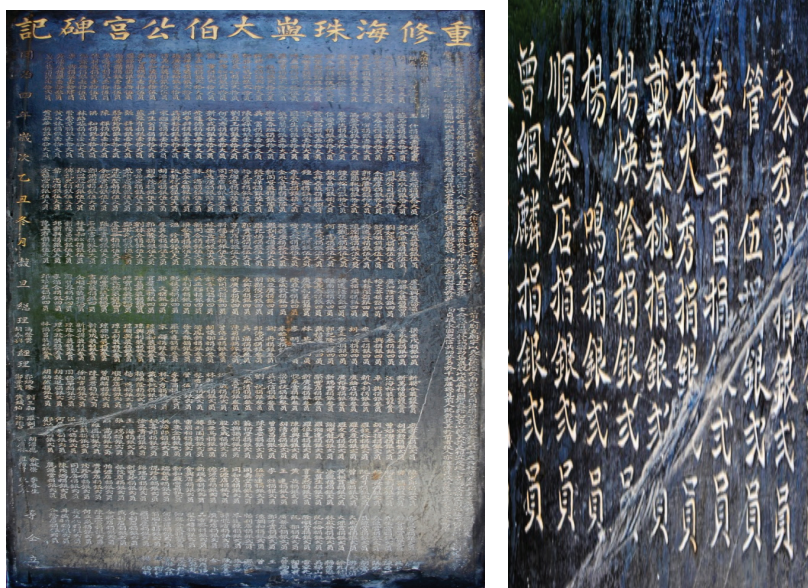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Sharom Ahmat,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 Malay State: A Study of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1878-1923* (Kuala Lumpur,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Monograph No. 12), 1984, P.g1.

附圖2 戴春桃之墓



資料來源: C. S. 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1964.

附圖3 重修海珠嶼大伯宮碑記(1866年)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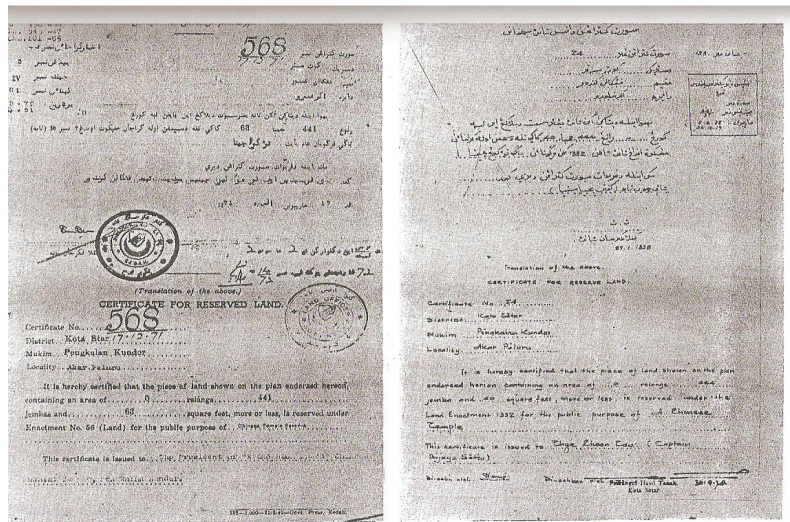
說明：小圖的照片是1866年重修海珠嶼大伯宮碑記的一部份。

附圖4 甲必丹戴春桃官印



來源：The Seal of Tai Choon Thow, Bearing the words “Kapitan Vijaya Setia Negeri Kedah, 1299A.H.” Arkib Negara Malaysia, Gambar Foto No. 2001/0021780.

附圖5 馬來領袖端武力與甲必丹戴春桃一起捐獻地給廣福宮的原文地契



資料來源：鐘錫金：《吉打河，歷史的河流：「禾浪波外」》，第1集，151。
說明：左邊是馬來領袖捐獻土地的地契，右邊是甲必丹戴春桃捐獻土地興建民眾神廟的原文地契。

附圖6 1896年暹羅政府與吉打政府合照



資料來源：“Sultan Abdul Hamid Halim Shah, Gambar berkumpul semasa lawatan Raja Siam ke Kedah, 1896,” Arkib Negara Malaysia, Gambar, No. 2001/0027556.

說明：戴春桃就是前排左邊第三位。

Research on Chinese Kapitan Tee Choon-Too of Kedah State

Yon Weng-Woe

Master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Between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and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ee Choon Too was recognised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Chinese Kapitan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Alor Setar, Kedah. He was of Hakka tribe, Huizhou Province, was born in China. He first reached in Alor Setar in the mid 19th century. At that time, the Chinese Dialect Groups of Alor Setar was made up mostly of Hokkien and Cantonese. As a Hakka, Tee Choon Too was able to be a Kapitan, leadi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Alor Setar, and being respected by the community. However, study about him was few and not in depth, his biography was briefly mentioned and even his tenure was unknown. This study would verify his life story and his tenure. Besides formulating the life story of Tee Choon Too, this study also state a different view of his success in officialdom. The study and formulation job above can be used as distinct basis for future study in Tee Choon Too.

Keywords: Tee Choon-Too, Chinese Kapitan, Kedah, Chinese community, Alor Setar